20 世纪苏东坡文学研究综述

饶学刚　朱靖华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语)苏东坡蜚声中外,不仅因他是宋代三大文学家(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之一(《人民日报》1983.3.19),中国历史四大名人(秦始皇、康熙、毛泽东、苏东坡)之一(英国某大学中国研究所),还因他是‘文学史上的多面手’(杨明照语),其影响十分深远。由于苏东坡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位极为复杂的知识分子,自宋以来,研究者对他的思想创作评价不一,涉及到生平年谱、作品版本、校正、笺注、评论、鉴赏等方面,直至当代。

一、20 世纪初～1949 年,为东坡文学研究的复甦散漫时期

前半个世纪动荡多难,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五四运动推进科学和民主,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中外文学的‘接触’和‘碰撞’,对孔孟之道有较大冲击,无疑也波及东坡文学研究。有的认为东坡是封建儒家卫道士。胡适等视宋词为‘活文学’和‘白话文学’。胡云翼提出‘主流’与‘逆流’说,将东坡等人的词分为‘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有远识的研究者对东坡文学研究仍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但未脱离传统的考释方法。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为世纪初东坡词研究的先行者。其代表作有郑文焯《东坡词》序(1905),二酉堂石印本《东坡词》(1909),冯煦《东坡乐府》序(1910),朱祖谋编校《东坡乐府》(1911)。20 年代－30 年代,东坡文学研究稍有进展,出现了短暂的勃勃生机,但缺乏宏观研究,大多限于词的注释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其代表学者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胡云翼、梁令娴、朱祖谋、俞陛云、叶恭绰、俞平伯、龙榆生、夏承焘、夏敬观、唐圭璋、詹安泰、缪钺、沈祖棻、叶圣陶、林大椿,赵宗湘、张尊五等。他们的词业建树,为百年来东坡词的研究起了奠基作用。品今《诗豪东坡》(《学灯》1925),林大椿校辑《东坡乐府》(中华书局 1926),胡云翼《北宋四大词人评传》(《晨报》1926),张鹏群《论苏辛词之异同》(《国学专刊》1926),叶绍钧选注《苏辛词》(商务印书馆 1927),勖吾《中国大文豪苏东坡的生平及其作品》(《海滨文艺》1932),龙榆生《东坡乐府综论》(《词学季刊》1935)和《东坡乐府笺》(商务印书馆 1936 年)。还有朱应鹏、胡思勉、张蕴、缪红、张其昀,王振于、洪为法、冀绍儒,顾廷龙,鸟公,介西等人在《觉悟》《宋代文学》《国学月刊》《艺壤》《史地杂志》《逸经》《青年界》《文艺战线》《北平图书馆馆刊》《国闻周报》《新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论述了东坡生平、创作尤其诗词风格、流派、渊源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王国维说东坡是中国四大名诗人(屈原、陶潜、杜甫、苏东坡)之一。(《人间词话》)还将西方哲学思想引进词论,并倡导‘境界说”。施议对《百年词通论》指出‘从王国维、胡适到胡云翼,或以‘境界’论词,或以风格论词,其共同缺陷就在于从外部立论。与胡适、胡云民办的理论相对抗的是词的本体论,这是况周颐的‘重、拙、大’理论发展起来的。”(《文学评论》1989[5])鲁迅也提及东坡是位敢于直面人生的中国文人(《鲁迅全集》),郭沫若写过不少类似《大江东去》札记的考证文章。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提出东坡词‘横放杰出”和‘清空灵隽’两境界说。夏承焘《东坡乐府笺》序言(《词学季刊》1935)认为东坡词有四创特色:追杜韩以言论为诗为词;好用典故;隐括前人诗文入词多用长序。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认为东坡诗词‘受李杜之影响较深,韩刘之关系为浅,此外陶渊明、韦苏州、王右丞诸家予东坡之助力亦大”。张尊五《苏子瞻之社会政策》《东坡行实录》《东坡文学》(《国青月刊》卷二–卷五),提

出东坡词创造了词的新气象，为北派之祖的观点。钱基博开辟了东坡散文研究的先河,全面论述了东坡各种文体(《东坡文讲录》1938)。东坡文学研究开始带上了现代文艺学的色彩。

至 40 年代，东坡文学研究向前跨进了一步。1947 年,林语堂《苏东坡传》问世。他提出东坡是位‘杂家’,儒佛道为其‘混合的人生观’的观点,且说‘艾子杂说’系‘伪托之作’。1976 年,曾虚白专文论林语堂与苏东坡的情缘时说‘林语堂借东坡’生活的折光来映照自己的身影”。书传超越了枯燥的史料堆砌，充满了生活气息、哲学思想和艺术魅力,体现了学者的系统的治学方法(《文学报》1989 年 3 月 31 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9 年为苏东坡文学研究的曲折前进时期

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文化、教育、科学出现转机，东坡文学研究走上正轨。1956 年 5 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大大推动了东坡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1955 级《中国文学批评史》,肯定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其创作属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果。这一时期，开始注意从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观念上来评价东坡作品。一批东坡文学研究者活跃起来，从年谱式的传记文学至诠释性的作品赏析，论文数以百计。

1957 年反右运动和 1958 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提出‘厚今薄古’口号,学术研究呈现凋零状态,东坡成为有争议的甚至被否定的历史人物。围绕着东坡的政治思想与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甚至文学风格展开了争鸣。王季思《苏轼试论》(《文学研究》1957[4]) 发表，讨论开始。持有异议者认为东坡向旧党呈书献策是反动的政治态度,对人生怀有‘没落的哀鸣’。东坡文学研究出现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化的政治倾向,讨论延续到 60 年代上期。马茂

元《评〈苏轼词选〉》(1959 年 11 月 15 日《光明日报》),马赫《略论苏轼的诗》(《文学遗产》1957 年增刊)坚持认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评价东坡的艺术成就。三年自然灾害时,纸张困难,迫使许多刊物停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对"人性论""共鸣说""共同美"等的大批判,东坡文学研究自然停息了。不久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央调整方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座谈会上,批判了极"左"思潮,重申党的"双百"方针,东坡文学研究随之出现了转机,开始冲破作品诠释之门,迈向纵横交叉的探讨之路,产生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版,1962 年)对东坡的生平、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作了系统全面历史的评价。同时又指出"东坡"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诗";"以诗为词"造成词的散文化和议论化";"一般说来是不成功的",隐括词"更是不足道"的。1957 年,赵万里为《东坡乐府》作跋,曹树铭校编《东坡词》的出版值得重视。

"文化大革命"尤其评法批儒期间,东坡文学研究陷入低谷。一夜之间,东坡又成了保守派、顽固派、投降派和两面派,作品全被否定。出现了《揭穿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南京大学学报》1974[1])《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苏轼》(《湖北文艺》1975[2]),《反对革新的吹鼓手一苏轼》(《四川文艺》1975[2])等批判文章。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拨乱反正的指导方针,科学技术迎一了春天。全国学术界为东坡平反。王水照《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文学评论》1978[3])徐中玉《略谈"四人帮"的反对苏轼》(《中华文史论丛》1978[5]),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 兼驳罗思鼎的谬论》(《历史研究》1978[7]),顾易生《苏轼的政治态度及其有关作品》(《文艺论丛》1978[11]),邱俊鹏《苏轼政治思想管见》(《四川大学学报》1979[4])等批驳文章,对东坡的政治

态度和文学创作作了全面客观历史的评价，还了东坡本来面目。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万云骏、吴世昌、缪钺等人发表了一系列东坡研究文章,上海《词学》创刊,对以后的东坡文学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三、1980 年 ～20 世纪末期为东坡文学研究多元化开放时期

近 20 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激励着苏学界。一批有识之士产生了忧虑与反应,倡议成立东坡学会,开展纵横交错的宏观与微观研究。1980 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以杂志的形式复刊。9 月在东坡故乡四川眉山成立了中国苏轼研究会，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从此结束了传统的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划线评判东坡功过的旧见。随后每两年举行一次东坡学术讨论会。眉山举行了两次纪念苏轼诞辰会。为纪念苏东坡贬儋 890 周年,海南儋州还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学术讨论会。众多研究者活跃在东坡文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上，东坡文学研究取向转移到学术文化阶段。

其一,东坡文学宏观研究有所加强,研究方法有所更新。研究者开始注意摒弃旧的研究模式,克服实证的传统研究法之弊,重视了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的现代化方法，把东坡文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东坡文学本质特征、东坡文学发展规律、东坡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研究结合起来，且置于宋代文化背景和地区亚文化研究中,进行综合的 多学科交叉的探讨。最为可喜的是 研究者们还运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甚至引入了计算机进行研究,呈现出许多文化原型多元化的重新组合的立体文化形态，王兆鹏称之为“范式批评”(《古典文学知识》 1994[1])的产物。近 20 年来,系统而全面评价“北宋文学革新运动领袖之一(姜书阁语)的东坡文学的著作有几十种。(篇幅所限,详目从略,有意者可向作者咨询,下同。—编者）这些专著，大多采用了中西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苏学作为学科近代化的重大研究课题、基础工程开始启动了。尤其不少专著的前言、专论、总论,论述全面、系统、深刻,提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许多新见解,王水照、刘乃昌同名《苏轼选集》的总论就是代表作之一。阵祖美采用“以意逆志”(《苏轼在密州》1995)法来研究东坡作品,张海鸥提出“用现代化意识阐述苏轼”(《文学遗产》1996[4]),杨胜宽《苏轼人格论》(四川大学版 1994)也采用阐释学方法认定东坡的文化品质就是东坡的道德人格和人生价值,他还在《苏轼论诗重清境》中,提出“东坡重清境”的诗学观。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院学报》1994[4]),认为宋代理学贯穿着东坡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王洪《苏东坡研究》,运用原型批评方法,提出东坡“野性”、“雅词”,“开了近代文学的先河”的见解。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运用了考据学、阐释学方法,提出了“苏东坡文艺创作黄州高峰”说、“赤壁二赋不是天生的姐妹篇”说,引起争鸣,又运用原型批评方法,提出“三维观照,时空交错”的“东坡文化现象”和“密州超然文化现象”,并认定《赤壁赋》和《超然台记》是东坡散文创作的两块里程碑。这些均属一种新思维和新方法。

其二,东坡儒佛道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关系的研究有所深入。继 40 年代林语堂提出的儒佛道为东坡的“混合的人生观”看法后,许多研究者亦已认同。蔡保兴、李庆皋、何满子、夏露等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儒佛道对东坡文艺思想的影响。赵捷等认为东坡政治上是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生活上是以佛老为主导思想。马银华《浅论苏轼的人生哲学及其渊源》(《镇江师专学报》1998[1])认为东坡与儒学的关系构成他人生哲学的最表层,即处世方式与庄学的关系构成他人生哲学的居间层,即处世方式与佛学的关系构成他人生哲学的最深层,即生活心态。周裕锴《游戏三昧:从宗教解脱到艺术创造》(第十届苏轼学术讨论会论文)认为东坡艺术创作是游戏人生、解脱人生的最佳方式。孙望、常同武《宋代文学史·苏轼》认为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兼融贯通,是宋代一般哲学思想的共同趋势,苏轼自然无法超越这种传统思想模式,但以“儒道消

长 ’论和‘ 外儒内道 ’说,尚未能准确描述出苏轼思想的个性化特色。邱俊鹏《简论苏轼知密州时期的思想》(《苏轼在密州》 1995)认为东坡知密州由自达 - 达物 - 自适的人生态度就是一种很好的描述和回答。许多学者对东坡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作了探索,认为东坡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刘焕阳《苏轼心态探微》(《泰安师专学报》 1992[3])认为东坡一生是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碰撞与激荡中,使内在心态分裂得到融会、统一与整合。王水照、滕咸惠、陈铭、杨海涛、魏启鹏、赵仁珪、周伟民、刘扬忠、王世德、梅大圣、马兴荣、罗忼烈、张志烈等又进一步从儒学、道学、佛学与东坡的文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的关系,提出了东坡创作的情感意境、内在超越、天人合一的原则,顿悟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与情感的统一论,涵泳着东坡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精髓。黄鸣奋《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7),闫笑非《苏轼的思想及其创作新控》(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采用系统论方法,为目光纵贯古今中外研究东坡文艺理论的力作。王世德《苏轼 “ 寓意于物 ” 与儒佛道思想》(《求是学刊》 1991[5])认为东坡受儒佛道思想影响而提出的‘ 寓意于物 ’的美学思想比德国哲学家康德早了 700 多年。多数研究者认为东坡儒佛道思想对东坡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极大的推动力,使他集宋以前百子诸家文学思想精华之大成,登上北宋文学创作高峰,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风貌 视野开阔,气势恢宏,想象奇丽,豪放浪漫,随意自然,精当超凡、自成一家。

其三,东坡诗的研究,大有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作不断问世(详目从略)。自宋以来,东坡诗评褒贬不一。传统法研究者认为东坡‘ 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是宋诗乃至东坡诗的弊病。“ 和陶诗 ”为平淡诗风之作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当今,老题新评仍然不少,对其肯定者较多。王洪《苏轼诗歌研究》(朝花版,1993 年)认为东坡‘ 以文为诗 ”,是东坡诗的优点,是艺术

自然回归的表现。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版,1998 年)提出了‘东坡词与诗文创作同步说’。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鸟瞰》(《文学遗产》1986[2])指出宋诗(包括苏诗)继唐雅文学仍保留着前进的势头。曾子鲁《试论苏轼诗词文会通的主要原因》(《江西师大学报》1993[1])阐明东坡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和以诗为文是歪玳学者对东坡诗、词、文相互渗透而创造新意境的最好评价。棘园《‘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南充师院学报》1981[4])和何凤奇、林冠群、张宏生的文章均认为东坡的‘和陶诗’也是一种新的诗风。萧瑞峰《苏诗时空艺术论》(《杭州大学学报》1991[4]),采用蒙太奇手法直接从东坡诗构成和创造的时空角度切入,探讨东坡诗的时空艺术特点。陶文鹏《论苏轼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江汉论坛》1982[4])等论文中提出‘谐趣、奇趣和理趣是苏轼的个性,才情、学养见识、审美情趣以及精神境界的显现’的见解,又在《清雄奇富,变幻飞动——论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中提出了‘苏轼的自然诗观、山水诗的艺术特征在于揭示了山水大自然的内含之理’和‘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的艺术价值。朱靖华《论苏轼诗风的‘高风绝尘’》(《苏轼论》京华版,1979 年)认为东坡诗风‘高风绝尘’不仅是东坡的艺术审美标准,而且是东坡的人生规范。马德富《苏诗以意胜》(《文学评论》1998[2]),提出‘苏诗以意胜’论。张志烈、杨胜宽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了苏诗的梦学美。 臧克家、霍松林、谢善继、敏泽、顾之京、胡国端、吴枝培、曹济平、陶道恕、王士博、洪柏昭、樊德三、胡守仁、项郁才、成善楷、张海滨、周本淳、章尚正、吴小如、王利器、张连举、祁念曾、刘逸生、曹道衡、王树芳、项楚、毛庆、闻虞等人的文章,通过名胜征、比兴、博喻、设色、通感、夸张、衬托、白描、时空交错、点染、互体、用典、联迹、梦幻、蒙太奇等手法赏析和讨论了东坡的政治哲理诗、咏史怀古诗、讽刺诗、谐趣诗、题画诗、挽诗等多种诗体的风格、渊源及时代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发掘了东坡诗

的多样、思想、无界、奇妙的艺术价值,如同周振甫指出 苏诗善用比喻,善于描绘各种形象,具有不同于唐诗的艺术特色,开一代宋诗新风。

其四,东坡词研究大有突破。除了对东坡最早的词作、词作编年、词作分期、词作类型、佚词考证外,研究者们集中探讨了东坡词风、音律、诗词疆界问题,旁及词心、词体、词境的研究。先说东坡的词风。自宋以来,对东坡词风聚讼纷纭。20 世纪 30 年代,郑振铎继明人张綖《诗余图谱》关于东坡词多豪放,少婉约体(风格)的看法之后,又提出东坡词"豪放宛曲"趋于一途"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 50～60 年代,有重思想、轻艺术,扬豪放、抑婉约的趋势。几部《中国文学史》都说苏东坡创立了爱国主义的豪放派。"新时期的词学界尤其是体制内派的主流首先想到的课题就是要推倒重豪放、轻婉约的'历史冤案'。"(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 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2]),陈迩冬《苏轼诗词选》后记(人民文学版,1994 年)说东坡豪放词与辛弃疾词并称为"苏辛词派"。张涤云《宋词的四大流派》(《语文导报》1987 年 10 月 10 日),将东坡划入"豪放派"。公木在《继承·借鉴·创新》中说毛泽东曾言"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他自称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表现在对东坡、张元干、岳飞、陆游、辛弃疾诸家的词博览、手写、引用、唱和上。(《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序,中国工人版,1992 年)。有的研究者认为东坡早期豪放词是有特色的、积极的,晚年平淡词是衰退的、消极的。严迪昌《苏辛词风异同辨》(《社会科学战线》1980[1])认为东坡词并非豪放而是清旷,引起词学界一番争论。邱俊鹏、曹学伟《"苏轼词风辨"辩》认为东坡确实创造了豪放词。周楞伽《周楞伽再答施蛰存》(《西北大学学报》1980[3])说:"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陈振濂在《宋词流派新探》中指出"从词的本体特征来看,在传统的婉约、豪放二

说之外,另增以苏轼为代表的‘清通派’。詹安泰、崔海正也认为以豪放、婉约来概括东坡词风就过于简单了。吴世昌《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文史知识》1983[9])则持异议,认为苏江坡不是‘豪放派’,他的一两首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也只是旷达词;‘连慷慨都谈不到,何况豪放’。顾全芳也说‘苏东坡不是豪放诗人’(《山西师大学报》1990[3])。施议对、刘杨忠、施蛰存、李家欣等也有似识,认为婉约与豪放仅仅是讲风格而不是讲流派。常被人引用的《赤壁怀古》等词至多只能算是旷达。何文桢《苏轼婉约词的创作特色》(《南开大学学报》1995[6])指出‘在现存苏轼340多首词中,其豪放词竟不足他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有人还说‘词应以婉约为正宗’。王水照《苏轼论稿》指出‘豪放’、‘婉约’两分法的本质是词体的正变问题。王季思《苏轼诗论》(《文学研究》1957[4])认为‘苏轼的词主要是把词引向正统诗文的道路发展,而柳永的词则主要是把词引向市民文学的道路发展。’刘石《苏词‘正’、‘变’之争的是与非》(《古典文学知识》1995[4])从题材广阔、音律突破、风格多样化的角度来看,东坡词是属‘变体别格’性质。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说:‘若以我看来,东坡的写法本是词发展的正规,他们认为变格、变调,实系颠倒。’而刘乃昌《宋词的刚柔与正变》(《文学评论》1984[2])则认为刚柔正变都有不可企及的优点,没有必要为某一派争正统。李莱、郭发云《苏轼与辛弃疾田园词创作风格异同简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4]),傅承洲《文学流派与苏辛词派》(《宝鸡师院学报》1991[1])均认为苏东坡与辛弃疾所处时代不同,词的风格有异,根本不存在什么‘苏辛词派’。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将东坡词分为清旷、豪放、婉丽三类。韩楚森《试论东坡词》(《丽水师专学报》1984[3]),认为东坡词属冲淡,旷达、飘逸的风格。薛祥生、叶喜莹、张忠纲等认为东坡词为豪放、旷达、婉约的三位一体。吴帆《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宝鸡师院学报》1991[1])认为东坡词为阴柔美与阳刚美产峙的风格,并在《试论苏

轼词的审美体式》(《长白论丛》1996[6])将其归纳为"英雄、美人、映衬式""人生、思索、哲理式""飞天、游仙,求索式"等十种体式。崔海正《东坡词研究评论述要》(《文学遗产》1990[1])将本世纪研究者们对东坡词风争鸣的意见归纳为如下八种:豪放说、豪放兼及其他风格说、超旷说、清雄说、精警说、雅词说、自成一家说、风格多样不定说。上述诸家之见,是否全面准确,有待进一步讨论。还有,夏承焘《"诗作"论》(《文学评论》1965[6])提出东坡词"有以豪放的语气表达颓废的感情"的见解;王恒展《论宋代豪放词的感伤情调》(《山东师大学报》1990[5])认为"苏词在豪放旷达格调背后弥散着一片沉郁浓重的感伤情绪";万云骏《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明确表示东坡"以诗为词"的表现手法"是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的";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3[2])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的确,东坡词充满了矛盾性、复杂性、多层次性。唐玲玲引东坡的"淡妆浓抹总相宜"诗句比喻东坡词风好就好在他的多样化。而刘乃昌、程千帆、詹安泰、李秉忠、罗忼烈、唐圭璋、宛敏灏、薛砺若、周笃文、王水照、谢桃坊等在他们的多篇文章中还是认为不宜用统计学方法,看作家作品数量多少来判定东坡词风格、流派,而应当肯定东坡豪放词开拓了词的题材,发展了词的表现技巧,变革了传统词律,开辟了南宋悲壮慷慨爱国的词风。马兴荣说"苏轼是词的革新家"(《苏轼研究专集》1980[10])。富有创见性、突破性研究的当是王兆鹏提出的"东坡范式"(《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的新命题。他不仅界定了东坡范式的审美规范,确立了唐宋词演变史的三部曲:花间范式一东坡范式一清真范式,而且明确了东坡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因而提出"说东坡词以其'豪放'风格影响于后世并据此说东坡开创出'豪放'一派这一命题本身能否成立,就令人"怀疑、困惑",企望重建东坡记号新风格学的见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次说东坡诗词疆界问题:“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宋人陈师道认为不是东坡词的成功之处。而今,吴熊和、施议对、杨海明也认为苏词与苏诗体调有异,风味不同,至多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误“以诗为词”,就等于把东坡看成‘短于情’的门外汉“苏词并非不协律腔的典范”。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陈师道说苏轼‘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大概就是指其‘不协间律’。许多研究者从东坡词学观的角度,阐述了自自看法,认为词合流于诗是当时东坡词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东坡词的主要特色之一。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东坡词的特色除了‘词境的扩大’‘词与音乐的初步分离’‘个性鲜明’之外,还有‘词的诗化’。朱大成《苏轼与南京‘婉约’派词》(《沈阳师院学报》1990[3]),杨佐义《苏轼词学思想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1[2])和王彬主编《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认为东坡从理论上肯定词为“诗之裔”提高了词的地位。王利华《苏轼对婉约词的雅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4])认为词归于‘雅正’是成功的。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认为东坡‘以诗为词’开创了一种‘开放型’的士大夫化的新词风。胡明《关于宋词》(《文学评论》1997[1])指出东坡‘以文为诗’的巨大实践,不仅为宋诗谋得了审美上的解放,而且他又‘以诗为词’,为宋词的审美上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崔海正《东坡词研究评论述要》对东坡‘以诗为词’的问题提出了他独自的看法:‘东坡‘以诗为词’问题,这本是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未说明东坡词‘要非本色’而提出的著名论点,现当代多数学者都把陈氏这个似乎否定性的前提变成了肯定性的结论,认为,‘以诗为词’是东坡词的一面光辉旗帜,而其内涵也不断扩大。现当代学者中有人提出过不同看法,古代学者如胡仔、王灼、王若虚、陈廷焯、郑文焯等人,亦曾对‘以诗为词’表示异议”。

再说东坡词是否协律的问题。这一问题自古至今争论不休。王延梯《漱玉集注》前言(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3)说:东坡‘以自己

的创作实践破坏了词的协律、表意必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意识……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开创豪放的风格以代替婉约的风格”;程千帆《苏词札记》(1956 年 12 月 23 日《光明日报》)认为苏词有意造成与柳永对峙的新词风,扩大词境,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音律对词的束缚。程毅中《东坡词的意境》(1957 年 12 月 8 日《光明日报》)指出苏词的特点除感情奔流、结构跳动、语言倾汇之外,也还有音律的解放。沈祖棻《苏轼与词乐》(徐州师院学报 1978[1])认为苏轼既能唱曲,又曾创作过一些自度曲,对于音律运用自如,是位当行作家。

引人注目的是将东坡的词学观提到研究日程上了。杨佐义《苏轼词学思想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1[4])提出‘歌词与声律的结合应该‘天成’”的观点;金铮《苏轼灵感论初控》(《江淮论坛》1984[1])提出东坡‘创作灵感’论;刘石《试论尊词与轻词 兼评苏轼词学观》(《文学评论》1995[1])提出‘苏词轻词’说,蒋哲伦《论东坡词的主体意识》(《上海师大学报》1987[2])提出‘东坡词主体意识’论;王保珍《苏东坡词中的时空观照》(《名作欣赏》1997[3])提出东坡词‘时空观照’论;叶柏村《论苏轼对词境的扩大与提高》(《浙江师院学报》1964[1])和于翠玲《试探苏轼词的清空意境》(《西北大学学报》1982[1])提出东坡词‘清空意境’说;周嘉向《苏词艺术辩证法初探》(《理论研究》1983[2])提出东坡词‘动与静、藏与露、虚与实’的辩证艺术观,雷啸林《东坡词的基线及其多层次性》(《社会科学战线》1985[3]),提出东坡词的‘基线及其多层次性’论;王华《由宋人词学观念的演变看宋词的命运》(《文学遗产》1998[5]),提出东坡‘以诗为词’为‘向上一路’说;杨海明《‘冷美人’与‘热美人’》(《文史知识》1993[6])提出东坡擅于塑造‘冷美人’形象而使词风‘雅化’说;饶毅《苏词之我表现手法论》(《中国文学研究》1993[3])提出‘自我;’的张扬和心灵的展示,是苏词最具魅力之所在的见解。这些都为东坡词学的研究扩展了新思路,富

有启迪性。崔海正《从(东坡词话)看江坡的词学观》(《东方丛刊》1992[1])则从词的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美学标准与价值尺度四个方面阐述了东坡词学观的基本内容。张惠民《苏门论词与词学的自觉》(《文学评论》1993[2])认为"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出版的著作有二十多种(详目从略)。这些专著都注意采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思维及新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特色。

从微观上来看,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七篇黄州词引起长达半个世纪、有上百个研究者参与、撰写成百上千篇论文的讨论，其情缘自不待言。无认旨宋培宪的东坡词二期说，龙榆生的东坡词三期说,朱德才、崔海正、欧明俊、全奇超、冷成金的东坡词四期说，还是孙民的东坡词五期说，都将黄州七词视为东坡词的高峰期标志。值得注意的还有密州三词的争鸣。1983 年由《光明日报》组织的"中秋词"的讨论对繁荣东坡文学研究很有启迪性。还有雷履平、王运生、刘崇德、钱仲联、陈正宽、徐翰逢、靳极苍、张志岳、周汝昌、袁行霈、钱谷融,郭风、於可训、段国超、王元明、童勉之、高培华、王宗堂等撰写专文,分别对东坡的爱国词、忠君词、宦情词、忧民词、怀旧词、爱情词、歌妓词、田园词、风景词、咏物词、友情词、唱和词、送别词、悼亡词、猎词和所谓的隐括词、回文词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透毛的赏析和热烈的争鸣。

至于东坡词的疵病也有论述。有人认为在思想上，东坡有些词成为精神避难所；在艺术上，东坡有些词就是那春愁秋恨的滥调,有些词纯属游戏文字。这是美中之疵,此处不多陈述。

其五,东坡散文研究大有进展。近 20 年来,出版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东坡散文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详目从略）。它们或将东坡散文放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下研究,或摒弃旧的'注经'模式，将点、校、注、译、评结合起来研究,都有新意。张志烈称东坡为宋

代散文的杰出代表(《读书》1979),余辛称东坡散文为宋代散文理论的高峰之一(《福建师大学报》1990[2])。多数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着眼,认为东坡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长于议论,精于思辨,善于将人生哲学的妙谛融入散文之中,形成其无穷的哲理思辨色彩和独有的艺术生命,是东坡异于和高于其他散文家的所在。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社会科学战线》1985[3])指出东坡散文具有"圆活流转之美""错综变化之美""自然真率之美"。王文龙《论苏轼的散文美学思想》(《宝鸡师院学报》1990[4])认为东坡的散文充满哲学、美学、道家思想,吸取了前人散文美学的精华,同时又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开拓:杂与博统一,以博为主;善与美统一,以美为主;法与天统一,以天为主;常与变统一,以变为主,从而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散文美学体系。何国栋《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美元州大学学报》1998[2])认为苏轼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关。不仅体现了苏轼的创造精神、美学趣尚、文学主张,而且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党圣元《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人文杂志》1998[1])认煤不坡的文章是由"立意""载道""辞达""自然"等说构建了理论体系。1964 年,陈毅来黄州东坡赤壁参观,认为《赤壁赋》不及《后赤壁赋》(《东坡赤壁》1982)。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赤壁赋》的主旨和《石钟山记》的写作视角开展了长达 20 多年的讨论,可以窥见东坡散文研究者们的探索精神。

东坡寓言研究是个薄弱环节。朱靖华《苏东坡寓言评注》(重庆出版社 1991)和《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京华出版社 1998)填补了专著研究的空白。还同孔凡礼一道,考证了《艾子杂说》确系东坡寓言,否定了林语堂的所谓"伪托之作"之说。徐国荣《苏轼的寓言创作成就》(《枣庄师专学报》1992[3])认为东坡寓言是继承先秦和柳宗元寓言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独创性。

从微观上看,近 20 年来,臧克家、吕叔湘、吴鹤九、林庚、郭预

衡、王达津、包景诚、吴战垒等对东坡散文诸如赋、记、传、说、论、书、题跋、杂记、小品文等一些篇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作了独到的研究。还有专研东坡简牍的张志烈《东坡书简人物辨》（第九辑苏轼不术讨论会论文）等都具有各自的特色。

其六，东坡春它方面的研究引起重视。

之一，比较研究。有平行比较研究，即从作家群体研究的角度作全方位的探讨，显示出东坡文学研究向纵深扩展的态势，如曾枣庄、毛大民、冷成金、王洪、曾昭岷等对东坡与父子兄弟、苏门四学士和六不士的关系及文学比较研究。有渊源比较研究，即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追寻东坡文学的文化渊源，如张志烈、敏泽、谢桃枋、棘园、吴汝煜等对东坡受陶渊明、李白、杜甫、柳永影响的研究。有辐射比较研究，即从东坡文学的流传对后世文人的熏陶的角度，突出东坡文学的历史地位，如周子瑜、周汝昌、方智范、李康化、王友胜、赵雄江、等对东坡给辛弃疾、元好问、郭沫若、毛泽东等的熏陶的研究。还有中外比较研究，如王水照、唐凯林(美)、王振泰、李占东、王相林、陈训明、青山宏(日)、柳基荣(韩)等对东坡的文学影响已波及到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前苏联、东南亚和美国的文学界的研究。

之二，考证研究。刘焕阳《苏轼初始作词时间考》(《烟台师院学报》1996[2])考证《一斛珠。洛城春晚》的作年应为宋仁宗嘉祐元年闰三月，为东坡第一次路经洛阳怀念新婚妻子王弗之作。朱靖华《苏轼论》认为《竹枝歌》是倚声填词，应作于嘉祐四年，《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应作于宋神宗治平元年，为东坡罢任凤翔赴京路过骊山时之作。薛瑞生《东坡前壬子词考证》（《西北大学学报》1992[1])认为《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应是宋仁宗嘉祐五年东坡25岁时的词作。这些看法尚待进一步确认，但他们“真积力久则入”(《荀子·劝学》)的进取精神，必将冲决东坡“早年无词”、37岁后才开始写词的旧说。孙楷第、刘少泉、孙兰廷、王树芳、曲德

来、曹思彬、邓加荣、姚海栓等对东坡的生平、行踪、出生地、葬地，东坡的称谓的由来的考察，对东坡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均于后人了解、研究东坡文学很有参考价值。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教研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4)，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 1998)，高崇德、吴雪涛《东坡词编年辨正》，冯媛、贾婵林编《苏东坡研究资料目录》(《黄冈师专学报》1998[4])，侯怡敏《苏轼文学研究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7[3])，林文光补充整理《解放后苏轼词研究论文索引》(《东坡词论丛》1982)，都运用了文献学、考据学、版本学、统计学等方法，将东坡文学及其研究历史状况介绍给读者。在年谱方面，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从日本觅回了国内久佚的旧抄本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十分珍贵。尤其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1998)这部翔实博洽、超越古今的新著，可谓集古今东坡年谱之大成，全以丰富、确凿资料取胜，开了中国著述史上年谱撰写的新河。

此外，以东坡生平、作品为题材，进行绘画、谱曲、编剧(包括电视)和演唱的创作作品也数以百计，将东坡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化了，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现象。

之三，研究者的研究。将近一个世纪，对东坡文学研究者为东坡文学研究付出劳动甚至毕生精力且有丰硕成果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自宋以来，这种对研究者的研究一直未断。本世纪之末许多研究者给一些研究专著写序言、书评成为热点，成为东坡学术讨论会的一项专题，值得赞赏。

近 100 年来，东坡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果丰富，新人辈出。于翠玲、王友胜、王洪、王兆鹏、邓红梅、方智范、刘尊明、刘石、刘焕阳、衣若芬、朱崇才、冷成金、张海鸥、杨庆存、杨胜宽、吴帆、严迪昌、范军、周裕锴、陶文鹏、夏露、莫砺峰、聂安福、萧瑞峰、黄鸣奋、韩经太、蒋哲伦、程义伟、梅大圣等都已锋芒大露，表明东坡文学研究前景十分喜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